

纪念

学恩深似海，情谊暖如春

——悼念徐文堪先生

荣新江

2023年1月4日，备受学界同行尊敬的徐文堪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79岁。听到这个消息，倍感悲痛。虽然近年来文堪先生信中常说自己年老体衰，但我看他还是沉稳坚韧，家族中有长寿基因，想来不会有碍，没想到在疫情即将到来之际，他却猝然倒下。悲痛之中，谨就与文堪先生交往中所受学恩，择要几点，聊叙哀思，以作悼念。

1986年苏州会定交

1985年我毕业留校任教，第一次出门是1986年5月跟随恩师张广达先生去苏州铁道学院参加“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苏州学术讨论会”。因为复旦大学毕业的芮传明兄当时在这里任教，所以召集了这次会议，虽然与会会长陈翰笙先生以及张广达、穆舜英、陈高华、周伟洲等老师参加，但会议以中青年学者联谊为主，我得以认识“文革”以后从事中亚研究的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

会上，徐文堪先生发表有关新疆考古发现的古人与讲印欧语的吐火罗人的关系问题，让我耳目一新。特别是他文章中引用了前一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贝利(H. W. Bailey)《于阗语文献集》(Khotanese Texts)第7集，我1985年7月从欧洲回国时带回一本，按照当时中国国内图书馆购买外国文献和编目程序来说，不可能这么快就在图书馆里读到此书。我底下问文堪先生在哪里看到这本书的，他说去上海外文书店二楼。我再看他那因小儿麻痹症而不方便的腿脚，对面前这位清瘦的《汉语大词典》编辑由衷敬佩之至。交谈之下，方知他从未出国，却对欧美各种西域语言研究情况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由此我们一见定交，开启了长达近四十年的学术友谊。

文堪先生大我17岁，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徐森玉(鸿宝)先生，因此他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自1986年在苏州与文堪先生相识，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师长，他对我也关爱有加，在使用电子邮件之前，我接到过他大量的纸质书信，有时一天一封；电子邮件通畅后，他的来信远多于我的去函。我虽然没有统计过，但他给我的信应当是学人中最多的，而且书写工整，一丝不苟，内容更是满纸学问，没有任何赘词。

书信往来 书籍传送

徐文堪先生从1977年开始供职于《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为《汉大》的编辑、出版贡献了人生最主要的精力。他做事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编纂《汉大》是他的本职工作。同时他也研究汉语史、词汇学、词典学，做词源考释，他的《编余问学录》把这方面的文章放在第一组，表明这是他的本行，理应放到首位。但他的兴趣是欧亚大陆的语言、考古、人类学，以及相关的语言交涉、基因和族群起源等问题，对于这些研究的把握，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靠到处跑图书馆翻阅图书来积累。文堪先生在这方面研究信息把握之快，判断出版物水平之准，我从他陆续的来信中倍感钦佩。我有有关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许多国外研究信息都来自文堪先生，他知道我开始集中精力研究粟特人时，经常告知我许多国外新的粟特学论著，特别是我熟悉的俄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他给予我的学恩，真的是难忘也难以回报的。

文堪先生收集学术信息恐怕不止图书馆一条途径。在使用电脑传输资料之前，他如有需要，会让我把相关资料寄给他，甚至从北大图书馆借出寄他，用完璧还。我想起的有台版的林语堂《摩尼教及其东渐》、魏汉茂的《伯希和与摩尼教》、龟兹会议论集《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等。后来我略微沾点稿费，就直接把他要的本手书复印寄给他，如Acta Asiatica 78、哈密屯(J. R. Hamilton)庆寿文集、Tremblay的Sogdian and Manichaeanism等等。虞万里兄悼念文章中提到他把台湾《汉学研究通讯》四十余册寄去参考，由此可见他把握信息的魄力和能力。

这样频繁的书信往来，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文堪先生自己出版的著作也都送我一册，我记录下来的就有《外来语古今谈》《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欧亚大陆语言及其研究论略》《编余问学录》。还有他和潘悟云合译的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我深感文堪先生是利用编辑之余的时间做学问，所以写出来的东西相对要少，但他毅力惊人，笔耕不辍。他也把其父的大著《徐森玉先生文集》《汉石经古文存》寄给我。此外，还把自己经手的一些图书送给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订本，有他编的《光明王国：图说摩尼教》，还有《近现代汉语新词源词典》《唐代文学

百科全书》《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有他帮忙校对的杨继东、邢引驰译杨维恒《唐代变文》，当然还有他帮王元化先生编的每一辑《学术集林》。说到《学术集林》，承蒙他的厚爱，我也受邀撰稿，但乏善可陈。1997年蒙他慨允，把在柏林调查吐鲁番文书以及所获欧美东方学家的信息，以给他的通信形式，在《学术集林》卷十发表了一篇《柏林通讯》。这篇通讯之所以采取书信模式，就是因为我的信太多，所以做一次集中的回报，其实平日里的信远比我的要长，要多。

对我编辑的各种书，只要有求于他，他都是全力支持，在《敦煌吐鲁番研究》上他发表过恩师瑞典(R. E. Emmerick)与蒲立本合著《一件中亚婆罗谜文拼写的汉文文献：晚期中古汉语和于阗语音新证》书评，在《唐研究》上发表过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书评；在《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表《关于〈向达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其中有珍贵的1947年7月18日曾昭燏致徐森玉先生的信。

文堪先生对我的学术研究十分关注，对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给予鼓励。2014年岁末他来信说：“从俄罗斯网站获悉，您来任该国际东方文献刊物编委，甚好。”这指的是我担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主办的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编委，国内很少有人关注，但文堪先生竟如此留心，特与激励。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是2019年6月15—16日我去复旦大学参加“丝绸之路写本文化与多元文明”国际研讨会，文堪先生看到会议议程，来信说因身体缘故，近一年没有去过，16日下午16时一场由我主持，他经考虑，打算在家人陪同下，前来参加，“以资学习，并向您和各位请教”。其实，这时他已经坐着轮椅，行动很不方便，但他明显是对我的支持，所以一定要来参加这一场。听完会他就离开，我送他，不免惆怅。

我每出一本书，都会寄请他指教；主编的书出版，也都寄给他惠存。2017年12月，我主编的《唐研究》最后一本出版后寄上，他马上回信：“惠赐的《唐研究》23卷收到，非常感谢。先生自1995年任主编二十余年，成就斐然，谨致崇高敬意！”这个肯定，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2020年11月我把新出的《三升斋随笔》寄上，随即接到文堪先生电邮：“新刊大作《三升斋随笔》已经在昨晚收到。连夜阅读，感到美不胜收，非常精彩。全书内容丰富，论断精当，充分吸取最新国内外学术成果，实非易事。我注意到您对岑仲勉先生大量论著的重视，很觉赞同。岑先生限于当时条件，有可商之处，但总体上是高水平的。近国内学人也开始注意自然科学和新兴技术方法手段研究人文和历史，我虽年老体衰，跟不上，但相信会有美好的未来，因附及之。多年来蒙您赐教，谨表最深切之感谢！”这好像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论学的信，文字也比较长，他最后的话似乎有点重心长。

“吐火罗”之谜

徐文堪先生最关注的学术问题，是新疆古代“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简单说来，在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小河墓地等处发现了距今近4000年的一批原始高加索人(欧罗巴人)，他们可能是从南西伯利亚经阿尔泰山南下到达塔里木盆地。而大约公元5—10世纪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焉耆、吐鲁番流行一种被定名为“吐火罗”的西印欧语，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讲这种“吐火罗”的吐火罗人就是公元前2000年以来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高加索人的后裔。文堪先生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发表了多篇文章加以论证。对此，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界都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个问题涉及到印欧人和印欧语的起源问题，也同印欧人和蒙古人的早期接触有关，甚至与人类的起源与不同支系的扩散问题相关联。

看上去外表完全是中式学者模样的徐文堪先生，其实思想意识是非常超前的，他对于新兴的分子人类学的人类学起源说、遗传学Y染色体和DNA测试、语言起源一源论、“欧亚超级语系”假



徐文堪(1943—2023)

说、“农作—语言扩散”假说等等国际上热门话题，都了如指掌，不断用各种文字形式讲述这些新学说的来龙去脉，并且把这些宏观的解说与“吐火罗”问题的解析联系起来，不断推进自己的看法。

为了及时把握“吐火罗”问题的学术脉搏，同时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他克服重重困难，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学术会议。1996年，他与国内考古学界的安志敏、韩康信、林梅村、水涛四位先生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持的“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国际研讨会，两卷本会议论文集1998年出版。这一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但后面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我都曾陪同文堪先生前往。

一次是2000年3月8日，我和徐文堪、林梅村、水涛一起飞往洛杉矶，转圣迭戈，在Quality Resort旅馆住下，我和文堪先生同室，同学兼照顾他。3月10日正式参加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整个会有两千多人，分成几个时段，每个时段有若干分会场，随个人所好，打游击式地听讲或报告。我们参加的是3月11日梅维恒主持的圆桌会议，题目是“新疆古尸对中国前史和历史时期研究的重要性”。梅维恒开场白后，丁爱博(Albert E. Dien)首先发言，他对梅维恒的看法有所批评。然后依次是水涛讲甘肃和新疆史前史的关系，林梅村讲新疆的史前石堆墓，我讲吐鲁番的三种葬俗，最后是爱尔兰皇后大学的马洛瑞(James Mallory)讲新疆古尸的学术意义和限度。各位发言后，梅维恒让徐文堪提问并讲述自己的看法。其实文堪先生对这个会议主题最有发言权，但他身份是编辑，按照美国学术会议的不成文规则，发言者一般都是来自大学和研究单位的人，他们不认为编辑能做学术研究。文堪先生一时兴起，讲的时间有点长，在座的许多人想发言质疑梅维恒的观点，结果袁清教授起来打断了文堪先生的发言。会后我赶紧把两位拉在一起解释，一位是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公子，一位是北京图书部主任徐森玉的哲嗣，可惜他们这次才得相识，于是也就一别两恨九伤了。

另一次是2013年6月26—28日维也纳大学玛尔策(Melanie Malzbahn)教授主持召开“吐火罗语文献的内涵：吐火罗语写本与丝路文化”国际研讨会，因为我

张充和1913年5月17日(农历4月12日)生于上海铁路公园南里，8个月大时由叔祖母收养为孙女。张充和的叔祖母是李鸿章四弟李瀚章之四女，未留下闺名，以法号“识修”二字传世。张爱玲祖母李经璠是李鸿章的女儿，与张充和的叔祖母识修是亲缘极近的堂姐妹，按此层关系说来，张充和、张爱玲也可以算是姐妹。

叔祖母抱养张充和后，不久叔祖母即返回安徽老家，在张充和成长的合肥岁月，张家已于1918(或1917)年由上海搬至苏州寿宁弄8号，1922年迁居九如巷9号。这期间张充和几度随叔祖母回苏州度假，居住在南园的李家别墅，也返张家小住。在合肥龙门巷一直生活到16岁的张充和，因为叔祖母的离世，再次回到苏州九如巷，这一次是真正回家了。

关于张充和离开合肥返回苏州的年份，目前看到两种说法，其一是1930年，充和17岁时，如《张充和手抄昆曲谱》中“充和生平大事记”(陈安卿编撰)中记载：“1930年，十七岁，叔祖母逝世，返回苏州与父亲、继母及弟弟们居住”。其次是16岁，如《合肥四姐妹》里，作者金安平写道：“祖母过世时，充和16岁”。苏伟作作的《天涯晚晴》中，张充和多次口述回到苏州时为16岁：“小时候读的是家里的私学，16岁才正式进学堂——进的就是我父亲在苏州办的乐益女中”“我跟着祖母一直到16岁，祖母死了，才回到苏州自己父母的家里”等。

七百条婆罗谜文题记做了整理和释录，其中最多的是吐火罗语(B(龟兹语)题记，也有梵语、回鹘语、粟特语等材料。

在这期间，我一有机会就向文堪先生汇报我们的工作进展，他不时也过问。2015年7月16日我去信给他：“关于龟兹石窟吐火罗语题记项目，我们断断续续进行了五六六年了，因为有很多学术之外的难处，所以我打算今年把这个项目结束，现在简报已经发了大半，最后整理成一个正式的报告书出版，相信对龟兹石窟研究、吐火罗语研究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次日就接到回信：“石窟正式报告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盼早日问世。这也是中国吐火罗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历史会留下记录的。”诸如此类，他一直是一位幕后的强有力支持者。

2018年6月《题记》书稿正式交付中西书局，书局要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需要两位专家推荐。我即请新疆考古专家王炳华和最懂吐火罗语题记意义的徐文堪两位先生。邀请信发去后，文堪先生立刻回复：“关于为龟兹石窟报告写推荐书事，虽然不敢当，但此系千秋大业，义不容辞，自当遵嘱写出请致。虽然发了许多重要论文，但国外学者仍然有点隔膜，深盼中西书局务必做好，尽可能达到一流水准。近日海外吐火罗研究较前热些，这是国内大贡献，有划时代意义。”

2020年11月我和赵莉主编的《龟兹石窟题记》终于出版，获原和庆昭蓉是解读题记的主力，我们十年的辛苦终成正果。当时我正正好在上海博物馆开会，所以让中西书局李碧妍联系文堪先生明日去送书，又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文堪先生看到后又马上来信：“在微信上看到您对《龟兹石窟题记》的说明，非常感动。您的团队十年辛劳，终于结出硕果，是有世界意义的。我得以先睹为快，自感荣幸。我因年老体衰日甚，做不了什么事。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多听到一些有关学术的好消息。”22日下午，我和李碧妍、王宇海一起往华东师大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快餐店，与文堪先生见面，恭敬地奉给他新出的《题记》三大册。他看上去身体很弱，但精神很好，见到书时异常高兴，并赠我打印出来的几篇新刊吐火罗语文章。我们谈了不短的时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怕他劳累，所以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告别。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昨天得以快晤，承惠赐《龟兹石窟题记》和新刊大著《从学与追念》，感激不尽！您今离沪返京，一切请多保重(闻北京已降雪)，并祝健康快乐！”虽然身体已经很弱，但文堪先生的学术热情很高，而且仍然是雷厉风行的性格。

2021年3月21日，我们在中西书局召开《龟兹石窟题记》出版座谈会，很荣幸地请来了王炳华、徐文堪两位。文堪先生坐着轮椅，身体显得非常虚弱，但他坚持发言，给予高度评价。他无法与大家一起用餐，早早由家人护送回府。当时我和大家都沉浸在新书出版的喜悦之中，没有想到这次会面竟是我与文堪先生的永诀。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韩天衡《卯兔望月》

“这一次是真正回家了”

陈蓓

达苏州；若是农历的8月26日(公历10月17日)离开合肥，回到苏州则在10月中下旬。然而，据张兆和日记，1930年7月17日，张充和已在苏州生活了。

《从文家书》中有张兆和这一天的日记，那时兆和正在苏州度暑假，当天的日记很简单，只有两行字：“早晚为四妹三弟四弟补英文，似乎减少了一些心境的安宁，但一空闲下来，便会想到一些难堪的事”，这里的“四妹”应该就是张充和。

《张宗和日记(第一卷，1930—1936)》里，从现在世宗的第一篇日记(1930年8月31日)中，我们也看到了四姐充和的活动。宗和是张家大弟，比充和小一岁，此后日记里充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1930年8月31日，阴，微雨，和四姐一块儿上青年会去剪发。等了好好一会儿才有人来替我剪，四姐已经剪好了。等我剪好，四姐已经好睡在一张女子理发处的长凳上，我只好把她拖起来。吃过饭，祖麟来了，三姐、四姐、我，二弟就一起到郊外去举行picnic。因为祖麟教了四姐的算数和三姐的世界语，所以她

清话

旧事琐记一则

有关许理和

葛兆光

看到上期《文汇报学人》(2023.1.7)上王邦维兄回忆周一良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1996年他去莱顿见许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以及谈到《佛教征服中国》的日文版，这让我想起一件事。

2000年，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在那个安静的小城，一面体验着这里秋冬之际的日短夜长，一面连日修订即将杀青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突然有一天，鲁汶大学汉学系的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提出，要陪我去他的家乡安特卫普和他的母校莱顿大学看看，而我正好要去十五世纪安特卫普印刷世界地图的工厂，和莱顿所藏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赠书及图画，于是便一同先到安特卫普，后经阿姆斯特丹，到了向往已久的莱顿。

那天傍晚后才到莱顿，匆匆下榻河边的一个民居的阁楼，天很黑，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早早睡下。第二天一早走到莱顿大学，见到钟鸣旦，他很高兴地说，他的老师许理和也想见我，我当然喜出望外。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是我早就读过的，我一直认为，这是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来最好的中古佛教史著作。一直以为他年纪大了，想来已经走不动，不容易见到，乍一听说能见到许理和，真是太高兴了。上午，我在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看了一阵高罗佩捐赠的藏书后，就到许理和的办公室。当时他虽然已经近八十岁，但是精神还很好，随意谈了一下佛教史研究(这是我有兴趣的)、天主教传教士研究(这是钟鸣旦有兴趣的)和我们共同认识的学界熟人(当然包括周一良先生)之外，他知道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还算熟悉，便兴致勃勃带我穿过走廊，去看他收集整理的荷兰早年有关日本图像的幻灯片，密密麻麻几大柜子，很让人吃惊当年荷兰人居然这样惦记日本，怪不得日本有所谓“兰学”。这些早期荷兰人绘画中的日本让我大开眼界，也联想甚多，原来，历史记忆、异域认识、世界想象，是可以通过这些图像再现的，这成了我后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推动“域外所藏有关中国图像”方向的灵感来源。

毫无疑问，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是我们必然聊到的话题。王邦维兄提到日文译本一事，也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我在1995年第二次访问京都大学的时候，“七力力书房”刚好出版了田中纯男等人的日译本，日本学者翻译向来严谨，不仅会仔细校对更正原著的失误，增添必要的注释，而且会为日本读者提供相应的背景知识。我当然马上买来一册，只是因为即将回国，没有细读便放进行囊。没想到，回到国内仔细翻阅，却发现这一册居然出现了日本出版业很少有的漏页和错页，于是立即写信给出版社。让我很感动的是，不到半个月，“七力力书房”很快寄来了书，而且附了一封诚恳的道歉信。

有趣的是，这部错版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而当年中译本译者裴勇先生和李四龙先生，在翻译英文原本的时候，需要参考日译本，向我借阅的，正是这部有漏页和错页的书。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们得请他一次。”

这个8月31日，是《别》中所述的“月份8月”吗？如果确是在1930年的8月26日从合肥启程回到苏州，虽然是回到父母之家，却是全然不熟悉的环境，那时的张充和还没有走出失去叔祖母的悲伤，至少需要一段适应过程，然而8月31日张充和已经剪发野餐算学，一派完全融入了苏州生活的家常日子，于情理都不合。

这样推算，张充和《别》中的“8月”一定不是1930年的8月，她应该是在前一年，即1929年已回到苏州，时间应在公历8月26日之后至10月下旬。

如果我们坚持“年份1930年”是正确的，看看是否有此可能呢？《合肥四姐妹》里说，张充和“叔祖母在家停灵49天后，之后再出殡”。1930年的正月初一是公历1月30日，充和几次提及“祖母春夭过世”，一般人概念上的春天不会指正月过年期间，这样1930年的春天至少也要公历2月间，如果叔祖母2月中下旬过世，49天后，最快也要4月初才出殡。张充和要在4月至7月初离开合肥，这样她才会出现在张兆和7月17日的日记里，那么和她自述的“秋冬之际回到家”又矛盾了。

长者回忆年少时，年份或记忆得不那么清晰，特别的某个年龄或记忆犹新，念兹在兹，纪录片里98高龄张充和那句“16岁以后我就是一個人了”，我想16岁的记忆对于张充和是刻骨铭心的。